

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师生情缘,其实是一个启迪后人的励志故事。在无锡大成巷,我依然能感受到这段感人的师生情缘。

## 听无锡的雕像讲张謇故事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四十六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引子:今年11月12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考察调研时指出,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。由此,想起张謇诞辰160周年之时,我曾驱车在大江南北寻访张謇的足迹,那情那景,依然历历在目。

“大伯,请问张謇读书雕像在哪里?”

投来一束茫然的眼光,老人摇摇头。

“大嫂,你知道赵菊泉故居吗?”

好奇地看看我,摇头擦肩而过。

站在无锡市大成巷创意市集十字路口的雨中,我连问好几个行人,均表露“无可奉告”之神色。

我迷茫了。

我来无锡,是寻找张謇与他恩师赵菊泉百年未了的师生情缘故事,没料想,刚开始就似乎要结束。

正踌躇间,走来几位保安。保安不是无锡人,对于我的询问,几个人同时一指:“喏,那里有座张謇读书的铜像。”

顺着手指方向看去,大成巷创意市集入口,有一篷绿树,勉强可称是花坛,花坛正面有堆用水泥黏合的乱石,转过去一看,乱石堆上镶嵌着一块铜像,铜像是清朝装束青年,左手握书,右手支撑在石凳上,眼睛低垂,专心读书,嘴唇微启,似乎正在诵读。不错,这铜像正是张謇,二十多岁的青年张謇。

原先,张謇读书浮雕本来不在这里,而在大成巷创意市集另一人口连元街小学的后门处。那时,经常有家长带孩子来到张謇读书浮雕前,给孩子讲述张謇读书的故事,勉励孩子苦心读书,奋发有为,很多外地人到大成巷游玩时,都会到浮雕前留影。

张謇一生有多位老师,但对他影响最大、帮助最大的有三位。一位是赵菊泉,一位是孙云锦,一位是翁同龢。孙云锦为张謇平息了冒藉风波,带在身边当秘书,后又举荐给吴长庆,随庆军赴朝鲜,才有后来惊动朝野的《朝鲜善后六策》等政论,从而成为清流党、洋务派争邀的人物;翁同龢特别赏识张謇,几次秋闱都属意张謇,但都阴错阳差误会迭出,不然,张謇也不至于到1894年恩科才高中魁首;至于赵菊泉,张謇一直叫他“恩师”“菊师”,常说“我的学问智慧得益于赵老师”,赵老师不仅给张謇免费供读三年,在告老还乡之后,仍留张謇在无锡继续深造一年,其师生之情显矣。

赵菊泉是江南名师,无锡人,24岁中举之后一直从教,毕生没有离开教育岗位,先后任无锡训导、海门训导,可谓桃李满天下,但最让他骄傲的学生还是张謇。张謇是19岁由父亲带去见海门训导赵菊泉的,赵菊泉



见张謇虽着青布长衫,但内里衣衫褴褛,又观其“脸庞清秀,牙齿刷齐”,言谈举止,聪颖不凡,当即收这位穷生为门生。因为张謇身遭冒藉诉讼,家里负债累累,赵菊泉帮助斡旋平息风波,又免其学费,“余从之游……三年未收学费一文”。由是观,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时首开师范教育免费供读之先河,同时大力倡导慈善事业,当受赵老师影响尤深。

赵菊泉在75岁上辞去海门训导告老还乡,那年,张謇26岁,专程护送“菊师”回无锡,在大成巷20号赵家“敦仁堂”继续深造一年。赵先生为张謇特设书斋,免费供读。赵先生视张謇为子孙,张謇尊赵师为“教父”。这期间,流传一段“缚竹苦读”的故事:张謇每每起五更,睡半夜,发愤苦读。有一次,赵菊泉半夜去看张謇,发现其被窝中有一根青竹竿,老师一下明白了:张謇睡在青竹竿上,翻身便会痛醒,一醒又起来读书。于是,“缚竹苦读”的故事成为赵家代代传习的典故。

在张謇一生中,时时不忘报答“菊师”之恩,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。张謇为纪念在无锡赵家读书的日子,专门为“菊师”修葺老屋,建造碑雕门楼,砖刻题字“入孝出弟”,并撰写三副楹联刻在门板上。为大厅屏门书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,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”,为恩师的左书房题“汲古得修绠,荡胸生层云”,为读书的右书房题“开径望三益,高谈玩四时”。为纪念恩师,张謇与同窗好友倡议在海门师范书院建“赵亭”,张謇亲拟《请建赵亭禀牍》,在亭内为赵师树碑立像。张謇亲自题亭名写楹联“人通利则思其师,几席三年,只落何堪高第列;公魂魄犹乐兹土,斋斋咫尺,风流敢告后贤知”,并撰写碑文:“无锡赵先生彭渊,官海门训导时,余从之游,提撕奖假,唯恐不至,三年未收学费一文,海门能文之士亦多游其门下。比与周彦升、沈仲瑜诸君集议,建亭于学舍之后,画

像刻石,以志遗爱。”

张謇创业之初十分艰辛,赵菊泉之孙赵翼孙应张謇之邀,来通襄助创办资生治厂,并从无锡招募熟练的技师工人。资生治厂退休老职工都为无锡人,即缘于此。在张謇举荐下,赵翼孙之子赵介丞到大生纱厂任总管,还安排赵介丞的五个儿子分别到南通垦牧公司、大生纱厂、复兴面粉厂、资生治厂谋事。赵家在为子孙起名时以“南”“通”“生”等字为名、排行,无不与“南通”“大生”相关,以缅怀张謇先生。同时,赵家还立下一条家训:子孙不得对外宣讲祖上是张状元的老师。赵氏五代子孙一直谨遵家训。因此,这条家训也尘封了菊师、啬翁这段感人的师生情缘故事。

“文革”中,无锡张謇书斋受到冲击。赵氏后人用毛主席诗词避盖张謇楹联,用泥灰将雕花门楼砖刻题字覆盖,逃过一劫。后来,张謇书斋“完璧归赵”,赵家自筹费用,将书斋修缮一新。1986年,无锡市文管会将张謇读书处列为文物遗址保护单位。时任副省长的张謇嫡孙张绪武闻讯后,专门题写“赵菊泉先生故居”匾额。

张謇与恩师的故事,曾经感动许多人,张謇读书处汉白玉碑建立后,成为弘扬无锡历史文化的一道招牌。在大成巷,我没能找到张謇书斋,不死心,继续展开搜寻。居委会的一位大嫂说,张謇读书处已经拆掉了,除了那个碑,在河西苑东南角有个房子算遗存吧。于是,我直着头,穿过雨隙,去找西河苑。找到一看,确有一处黑瓦卷檐的老房子,是不是张謇读书的地方说不上,现在成了棋牌室。

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师生情缘,其实是一个启迪后人的励志故事。在无锡大成巷,我依然能感受到这段感人的师生情缘。我不知道海门的赵亭是否还在,如若不在,是否可以恢复?毕竟,这段延续了百年的师生情缘,不该再被尘封。

父亲用自行车驮我去“东海部队”看电影。我们去晚了,只好到银幕后面看,而银幕后面也站满了人,我只好爬到自行车后座上。

## 露天电影(之三)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在我童年记忆里,有两个庞大的磁场至今仍印象鲜明,历久弥新。一个庞大的磁场是菜场。那时小镇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菜场,街道就是菜场,可以这么说,街道有多大,菜场就有多大。从东街头的包桂红家门口起,到西街尾的胡福基家门口结束,沿街摆满了一应交易的各种农产品。当然,海产品,主要是文蛤,悉数收于八鲜行囊中。一大早,菜场像巨大的磁铁吸引四乡八邻的人们马不停蹄地赶来。我姥姥把赶早市称为赶集。与山东高密村镇不同的是,后者十天半月才赶一次集,而我们这几天每天都赶集。我姥姥起得很早,我家对门(隔着一条马路)的陆善堂家也起得很早。陆善堂早上起来做的头一件事,是将修理脚踏车的一应家伙摆到门口,包括打气筒。打气筒遍布油漆,把手上也是乌漆抹黑的,即便如此,来给车胎打气的也是络绎不绝。陆善堂好像有一辆永远也修不好的脚踏车,他将这辆车子脚朝上置于当门口,然后他坐于两个车轮之间,埋头捣鼓什么,既像是接车链,又像是补车胎。然而,在我看来,他像在放电影,不过,我从未见过车轮这么大的片子。有一段时间,我希望电影片子有车轮这么大,这样就不必中途换片子,人们的兴致就不会被突然掐断了。

我姥姥挎着菜篮走出院门时,除了看到坐于两个车轮之间的陆善堂,还看到去茅坑倒马桶的冯耀珍。冯耀珍是陆善堂老婆,很胖,人很良善,我们这些孩子都叫她胖子大妈妈。而我姥姥则称她为朝东家的。端在冯耀珍两只手上的圆形马桶很大,像一面大鼓。平时,这马桶就搁在脚

箱里。那个年代,启海人家女儿结婚,陪嫁之一就是脚箱。脚箱主要是放马桶用的,摆在床前的踏板上。因为装在里面的排泄物太多,马桶显得很沉重,所以冯耀珍只好将马桶贴在肚子上,让肚子分摊马桶的重量,一摇一摆地朝茅坑挪着步子。看上去,冯耀珍就像个十月怀胎的老孕妇。把这么重的马桶端到茅坑,其实是个技术活儿。且不说手臂得有力量,步子也很有讲究——一步幅既不能大,也不能小,最重要的是把握好韵律,让马桶里的排泄物有规律地摆荡。所以,冯耀珍按照一定的节拍挪动步子,要是节拍错了,马桶里的排泄物就会溢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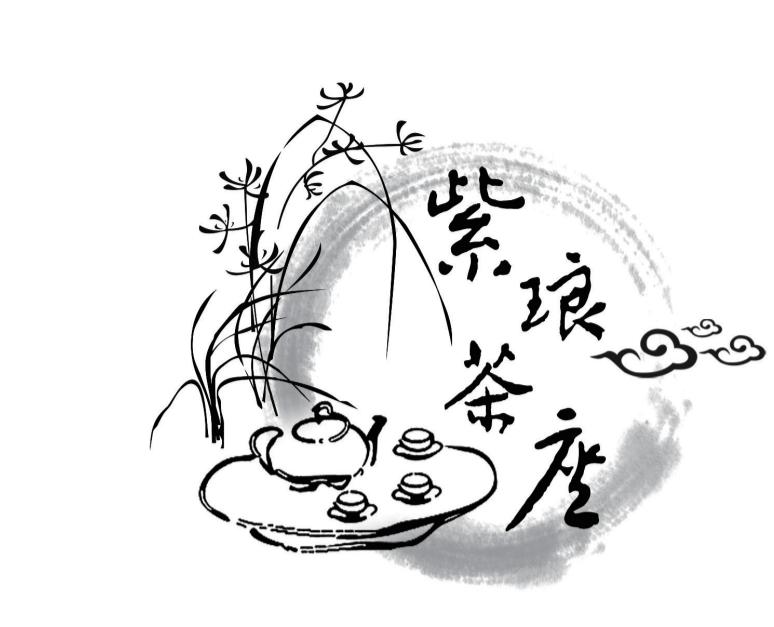
陆善堂家的茅坑正对着我家院门。我至今仍记得茅坑座左侧有个长方形的小墙洞,里面摆着那个年代使用的“厕纸”——一捧剖开的芦苇秆。那不叫擦屁股,而是刮屁股。这时,冯耀珍已经来到茅坑前,她看到我姥姥正从院门出来,便说,“姥姥去买菜啊?”。当着面,我姥姥不叫冯耀珍“朝东家”,而是称呼“他大妈妈”。我姥姥说,“他大妈妈,俺去赶集呢。我姥姥虽然来南方多年,但还是保持着当年在山东老家的习惯,将“买菜”说成“赶集”。说话间,车辆和人流从马路呼啸而过,涌向东街口,并从那儿朝街心汇聚。早晨的小镇喧腾起来了,各种声音次第响起。它们扭结纠缠在一起,互不相让,又互相拥抱着,使得整个小镇动荡起来,摇摆起来,这种状态将持续大半个上午。这是小镇的日常景象,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年复一年。

另一个庞大的磁场就是“东海部队”的露天电影场。每隔十天半月,就有一辆马车从小镇东街口的马路上疾驰而过。马车上驮着放映机和放映员。从马车驶过的那一刻起,人们就奔走相告:“晚上‘东海部队’放电影!”。小镇顿时喧哗与骚动起来。与此同时,消息像长了翅膀,从小镇飞向四乡八邻。当黄昏降临时,人们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朝“东海部队”涌

去。那种劲头绝不亚于早上到小镇的赶集。那其实另一种赶集——赶精神之集。有一次,我姥姥也迈动着粽子小脚,赶到“东海部队”看电影。她被人流裹挟着,东倒西歪,最后只好停在路边,等人流涌过去再踽踽独行。我常想,那个年代,要不是有“东海部队”的露天电影,人们的精神生活该是何等的苍白啊。

“东海部队”的露天电影场其实是个篮球场,位于部队的大门外。在篮球场与大门之间有条沙砾铺的甬道,道路的北侧安放着一座木头岗亭。站岗的士兵一般都待在岗亭里,从外面根本看不出什么。有时我们这些孩子会产生错觉,以为岗亭是空的。可是当我们蹑手蹑脚跑过去(部队大院内的生活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),岗亭里突然有枪刺伸出来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我们吓得掉头就跑,一直跑到很远才敢停下来。转身看,并没有人追出来,这才大大松了口气。

用篮球场来放电影,根本盛放不了潮水般的观众。很多人只好在银幕后面看。在银幕后面看与在银幕正面看,同样能满足视觉欲望。但我不喜欢在银幕后面看,这会给我第二天跟小伙伴重温电影情节时,带来叙述障碍。因为从银幕后面看,人物的所有动作都是反的。有一次,父亲用自行车驮我去“东海部队”看电影。我们去晚了,只好到银幕后面看,而银幕后面也站满了人,我只好爬到自行车后座上。电影场最好的位置留给了解放军,我看到对面向解放军坐成整齐的正方形。那时我多想坐到他们中间啊,这样不仅能在最好的位置看电影,而且还能抚摸他们夹在两膝间的枪,那可是真家伙啊。我一厢情愿地认为,父亲能满足我这个欲望。父亲当过兵,我天真地以为父亲是认识“东海部队”的解放军的。当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时,父亲并没有理我,而是一个劲地抽烟。一直到把电影看完,父亲也没吭声。我委屈极了,在回家的路上,我差点哭出来。后来我才意识到,我的这个想法是多么荒唐啊。



民族文化大融合,本身就是相爱相杀的过程,强大的文化终究会改变影响弱小的文化。

## 山花碑:美到极处是虚无

□强雯



博物奇妙

“山侵河处河镜倾,河侵山岭递”,一米二高的山花碑,阴文,华丽中浸润伤情。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美与哀,在全碑楷书中显得正式而汹涌不绝。山花碑碑质为大理石,藏于大理市博物馆碑林,号称白族第一碑。

碑刻,镌刻在石头中的字词,没有一个字是白写的。一个侵字,让人思量其深意。

翻开历史卷宗,确实有深意。这与元末明初的各方政治、军事势力有关。

朱元璋虽然击败了大多数元朝参与势力,在南京称帝,建立明朝,设洪武元年,但云南一带在明初并未纳入版图。天高皇帝远,何况是开国皇帝,人家地方势力强大,不买账也说得过去。

不过云南一带坐地为王,并不是孤立的,而是政治联盟。那时,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一带依然处于元梁王的据守控制之下,臣属蒙古“北元”政权,那梁王凭借边疆山高皇帝远和苦心经营云南百年的根基实力,自坐为大。当时云南的主要蒙元势力,有蒙古政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国国王后裔——土酋段氏总管段明。梁王,以昆明为统治中心,大理段氏,控制着滇西一带,都听从北元指令。

这让朱元璋如鲠在喉。

“云南僻远,不宜烦兵”。明朝初期,朱元璋以招安为策。先后七次派出使臣前往滇地召谕梁王,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。梁王一口回绝,并几次杀害明朝使臣。颜面尽失,也得咽下这口气。

直至国力休养生息了十余年,洪武十四年(1381),朱元璋决定以武力征讨:“云南自昔为西南夷,至汉置吏,臣属中国,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自恃险远,桀骜梗化,遣使招谕,辄为所害,负罪匿匿,在所必讨!”

在云南曲靖的白石江战役中,血流成河,明朝军队所向披靡。后直逼昆明,将梁王的政权一锅端。明军继续南下,到达大理。洪武十五年(1382)闰二月,段氏后院大理被明军攻克,第十二世段氏总管段明束手就擒。

半年之后,云南江山易主,尽归明朝。为开发西南,巩固边防,明太祖下令,在云南省府昆明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,管理云南军政事务,着手处理接收云南事宜——奉旨将蒙古梁王集团成员,梁王家眷、元蒙上层官员和大理段氏贵族头领全部押解北方,交由朝廷处置;清扫元朝残余势力和大理地方势力,就地遣散并安置数十万蒙古俘虏士兵;建立明朝新的政权机构;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,屯兵戍守。之后,洪武十七年(1384)三月,傅友德、蓝玉率部分征南大军班师回朝,留下沐英继续镇守云南。

成为大明王朝的一部分后,白族人自然要服从汉文化的管理。作为文化共融的时期,洪武汉文化正在大肆拥抱、改变白族的文字、文学创作、文化理念,甚至官场条例。

最敏感的当是白族的文人。

山花碑是这个时期的孕育物,碑上共有10首山花体诗歌,排列整齐,看上去也十分利于朗诵,不过初读山花碑,大的美感很快被细读的艰涩所替代,有些词句简直是不通,后来才发现借用

汉字的音和义来写白语、读白音、解白义。白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。碑上刻的,就是这样的古白文。比如,“长寻细月白风清,不贪摘花红柳绿。用颜回道虚浮生,得尧天法度。”这还算是比较好理解的,是说,月白风清之日,不要贪爱繁花之美,用颜回的道术来理解虚浮的人生,就能得到像皇帝尧一样的盛世景象。

而有的句子能在汉语俗语中找到对应,但是个别的字词,却在字典中查找不到,比如“分数哽侔土成金,时运车舛金成土,聚散倡浮云空花,实阿莫不无。”这句话的意思,在《金瓶梅》《三言二拍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中都有提及,其表述是,时运来时土成金,时运走时金成土。悲欢离合一杯酒。聚散成败转头成空。

白族与汉族在文字上的姻缘,在山花碑上表达得其实比较甜蜜。民族文化大融合,本身就是相爱相杀的过程,强大的文化终究会改变影响弱小的文化。在山花碑上,读者甚至可以感觉到,我们不了解的白族,其实和我们一样,话语、情绪、人生体验,都是大同小异,虚无竟然是不分民族、地域存在的共同情感。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们对白族这个陌生民族的理解。诗句中隐晦的抗争,无力的抗争,也在唤起相似的历史记忆。比如汉文化历史上刘邦项羽争雄,霸王别姬,痛与虚无,大致无差。

苍山洱海是大理白族人的家园,苍山景色向来以雪、云、泉著称。经夏不消的苍山雪,无论是阳春三月,还是萧瑟冬季,苍山都显得娴静安然,冰清玉洁。洱海,在古代文献中曾称为叶榆泽、昆明池、西洱河、西二河等,位于云南大理郊区,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,因为湖的形状酷似人耳,故名洱海。

如此美好的仙境,却不能自己当家做主,白族人微妙的内心隐隐作痛。山花碑固然是对苍山洱海的赞美与抒情,却是透出某种抵抗和不甘。

山河美景,万般美好。而碑文后部分却是人生虚无不可把握之叹,“天堂是荣华新鲜,漂散成地狱。”

先扬后哀的歌调,是一个人看尽繁华背后的虚无与悲凉,这种声调,在清代《桃花扇》中,是同样的迷离。“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,这青苔碧瓦堆,俺曾随风流觉,把十年兴亡看饱。”在《红楼梦》中,哀凉更是一阵阵入髓,叹富贵命运、王孙权贵,最后皆“白白茫茫大地,好个干净”。

山花碑碑文的作者,刻写在碑末的诗句中,名叫杨黼,生于明代,大理下阳溪人,其先辈是大理国和元代的望族,《明史·隐逸传》中载有他的传记。幼时读书万卷,但一直生活在民间,有不少著述,山花碑是他用白族民族传统的诗歌形式,所写成的洱海风光的山水诗之一。明代著名白族文人李元阳还专门为他写过《存诚道人杨黼传》。

但要真正读懂这些诗,还需要读一读山花碑另面刻写的《圣元西山记》。这其实是碑石的正面。它披露了杨黼的身世:远祖杨连在大理国时“为王左右”,祖父杨智系元代云南平章大理路总管段功家臣员外,曾授元帅。后段功被梁王所害,杨智闻说亦赴死,其父杨保也是段氏元帅,明洪武十五年(1382)傅友德率军平滇时,自缢殉国。家族的不幸,江山易主,百感交集,集